

黄建良 编著

中国相术与命学探源

新华出版社

970024

目 录

2.3
3

上 编

- 一、历史踪迹 (1)
 - 1. 蒙昧时代：
 笼罩于夏、商、周三代的天帝命定论 (2)
 - 2. 混沌初开：
 春秋战国之际个人命运的思考和相术的诞生 (5)
 - 3. 点化成金：
 两汉之际的相命热以及相术、命学理论的初建 (11)
 - 4. 迷狂岁月：
 泛滥成灾的唐宋相术文风和命学家族的繁衍 (18)
 - 5. 百川灌河：
 明清之际相术、命学的系统整理 (26)
- 二、相人、命士 (35)
 - 1. 成分解析 (36)
 - 2. 白衣卿相 (44)
- 三、家族谱系 (51)
 - 1. 相 术 (52)
 - (1) 结穴看相法 (54)
 - (2) 相 笏 (54)
 - (3) 太素脉 (55)
 - (4) 三世相法 (56)
 - 2. 时辰推命 (57)
 - (1) 五行称命法 (58)
 - (2) 贵贱定格五行相法 (58)

(3) 扑地魔	(59)
(4) 两会铺	(60)
3. 八卦、易象推命	(61)
(1) 皇极先天数	(64)
(2) 范围数	(66)
(3) 成数大定	(66)
(4) 八卦推命法	(66)
4. 星象推命	(67)
(1) 五星推命法	(69)
(2) 九宫八卦通法	(70)
(3) 紫微斗数	(70)
(4) 星座推命法	(71)
5. 功过格	(74)

中 编

切片之一——“风鉴”	(76)
一、“风鉴”概说	(76)
二、看相的种类	(79)
1. 相 骨	(79)
2. 相 面	(83)
3. 相 身	(104)
4. 相手足	(105)
5. 相形神	(116)
6. 相气色	(118)
7. 相声行言谈	(125)
8. 相痣	(128)
三、女相种种	(132)
1. 女性寿夭之相	(132)

2. 女性善恶之相·····	(133)
3. 女性贞淫之相·····	(133)
4. 女性贵贱之相·····	(134)
5. 女性婚姻之相·····	(135)
6. 女性刑克之相·····	(135)
7. 相妊娠·····	(136)
切片之二——“八字” ·····	(138)
一、“八字”概说 ·····	(138)
二、“八字”推命的原理 ·····	(140)
1. 阴阳五行·····	(140)
2. 四时方圆·····	(143)
3. 寄生十二宫与五体旺·····	(145)
4. 天干地支·····	(146)
5. 干支的会合刑冲·····	(151)
6. 干支配合·····	(156)
7. 三元·····	(158)
三、“八字”编排法 ·····	(160)
1. 推年法·····	(160)
2. 推月法·····	(161)
3. 推日法·····	(162)
4. 推时法·····	(163)
四、推命与命局 ·····	(165)
1. 神杀(煞)推命法·····	(166)
2. 纳音推命法·····	(178)
3. 六神推命法·····	(187)
五、行运法 ·····	(205)
六、“八字”推命的内容 ·····	(208)

1. 性情形状····· (208)
2. 贫贱凶恶····· (209)
3. 寿夭····· (210)
4. 六亲····· (210)
5. 女命····· (212)
6. 合婚····· (213)
7. 疾病····· (214)

下 编

一、结晶：中国古代相术、命学博大精深的涵容····· (217)

1. 相术、命学与哲学····· (217)
2. 相术、命学与伦理····· (231)
3. 相术、命学与宗教····· (239)
4. 相术、命学与科学····· (246)

二、辐射：看相、算命习俗对社会的影响····· (254)

1. 政治····· (254)
2. 军事····· (256)
3. 艺术····· (258)
4. 世俗生活····· (265)

三、渗透：看相、算命习俗对民族文化心态塑造的参与····· (271)

1. 命运观····· (271)
2. 审美观····· (280)
3. 价值观····· (285)

四、窥视：对相术、命学的思考····· (289)

1. 历史的诘难····· (289)
2. 泛说印象····· (293)

一、历史踪迹

看相、算命的习俗，是中国古代最为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之一。但是由于“末流猥杂、不可殚名”，人们反而忽略了它特殊的文化价值，以至于今天我们还不曾见到一部有关它的较为完整系统的“行状”。人类文化的演进，有着自己的历史逻辑，并遵循着自己的工作程序。不了解相术、命学的起源，就无法窥破它的性质；不弄清相术、命学发生、发展、颓败的生命历程，就难以把握它活生生的精神命脉和内部机制；不考究中国古代看相、算命习俗的具体表现和嬗变演化，就不能恰如其分地估量这一文化现象所造成的或正或负的社会功能。为此，在本节中，我们试图从三个方面，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作一个简略的历史还原，并以期获得相应的发现：

——从不同时代社会环境和“精神气候”的还原中，发现相术、命学得以发生、发展的政治和文化因素。

——从相术、命学自身的发展、繁衍的历史程序的还原中，发现它与哲学和其它文化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决定它面貌的文化原理。

——从不同时代，不同风貌的看相、算命习俗的历史现象的还原中，发现时人与之契合的精神状态和逻辑思路。

1. 蒙昧时代：笼罩于夏、商、周三代的天帝命定论

和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一样，中国相术、命学这一社会文化样式的产生和看相、算命习俗的肇端，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那么，我国产生相术、命学的“环境”和“时代精神”又是什么呢？我们不能不考察一下它们的起源。

就像行医的总爱吹嘘自己是十八代的嫡传，以示不凡一样，中国命学家数起自己的家世，也往往要高攀几位圣人，以示正宗：

“命理之学，由来久矣。古之言命者，简而赅，庖牺曰‘正命’，仲尼曰‘天命’，老聃曰‘复命’。类皆得之于天，赋之于人者。”（《滴天髓阐微·孙序》）

“尧取人以状，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

（《三朝记·少闲篇》）

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传说中的人类的始祖庖牺，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聪明的领袖尧、舜，周朝的创始人文王，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和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牌位，一古脑儿全搬进命学的庙堂，作为命学的开山之祖，祭祀起来；也不管传说中的庖牺究竟和谁讨论过命理，尧、舜、文王的命相故事有几分可靠，孔子、老子的“命”说和命学家说的命理是否都是“皆得之于天，赋之于人者”，便作为师承祖训。如此这般的惊人之论，异声同曲，历代不绝。说的人多了，便为“一说”，别说是芸芸人生被镇住了，就连有些学者也被蒙住了，甚至也下

起了“相法堪与，三代前已有”的结论。

这类惑世之说，流传甚广，必须一辨。

我们知道，预言个人今后的具体的命运内容是相术、命学的根本目的，但个人命运的观念则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命运的含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定的内容。因殷、商、周三代以前“茹毛饮血”的原始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极端低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极端简陋和贫乏，每个氏族成员只有在氏族集团之中方能生存，任何人都生活在同一水平之中，不存在着超越氏族群体生活水平之上的贵贱、贫富的现象。因此，在“三代前”这样一个混沌的时代，并不具备相术、命学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气候”，当然，也不可能产生研究个人命运规律的命理之学。

中国先民对命运比较自觉的思考，还是进入距今三千多年的奴隶社会之后的事，但他们说的“命”并非主要是指个人的命运，而是神秘莫测的“天命”。在他们看来，“天”是至高无上，能体现主宰万物的“天”的意志的，便是“天帝”。

“天生丞民，有物有则。”（《诗经·大雅·丞民》）

天帝生育了他的子民，严格地规定了各人的名分，但对有违他的意志的人和事，板起脸来则无情无义，六亲不认，降灾降难，严惩不贷。所以，天帝不仅决定了人的贵贱等级，而且还持生杀大权，主宰人的吉凶、祸福：

“上帝临子，贰必有咎。”（《国语·晋语》）

“先王有服，属守天命。”（《尚书·盘庚》）

无论是天子还是黎民，吉凶、祸福的前途命运无不被天帝把握。且“贰必有咎”，哪怕再倒霉，除了“恪守天命”，谁还敢有什么非分之想？这也难怪时至春秋，天帝这种肃杀的威严仍不减当年。一个又贫穷又不得志的士大夫，“忧心殷殷”几乎到了走

投无路的地步，唱唱“天宝为之，谓为何哉”的小曲，也就心安理得，得到精神上的解脱，一了百了了。

这种天帝命定论的天命观，甚至从字义学上也留有浓重的痕迹。汉初根据上古史籍而辑成的字书《尔雅》，将“命”与“令”、“禧”、“诉”、“请”、“讯”等归之为一类，解释为祈祷神灵，沟通天命，将“福”、“禄”与“祉”、“祿”等字归之为一类，解释为“”，甚至有人干脆将它称之为“天禄”。将“吉”解释为“祺祥”，将“凶”解释为“咎”，但凡这些都与“天命”相关，这实际上都是一种天帝命定论的曲折反映。

其实，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帝，就是人间的天子。这种天帝命定论的观念，实为统治阶级神权政治的思想反映。夏、商、西周政治上实行的是以严格的嫡长子世袭、庶子分封的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制，经济上实行的是国家公有的井田制，为巩固这种制度，他们又实行严格的等级制。

氏族血缘关系的亲疏，直接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各阶层的承袭，上至天子，下至管理马牛的小官吏，贯彻的都是“以长不以贤”的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母以子荣。”一个人能否有荣华富贵的前程命运，全看天帝所决定的与天子之间的血缘关系如何，这就是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所谓的“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的奴隶社会的封建制。严格的礼制又将人们生活纳入了各自的规范模式，乃至想多设一鼎，衣服穿错颜色，都被视为弥天大罪，而这一切，又被认为是“天帝”的意思所决定了的，终身不变，千古永恒的。既然人一经出世，他一生的贵贱、贫富、福祿都因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明明白白地规定好了，而且还“有动作礼仪威仪之则以定命”，更可怖的是若不安分守己，“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这

一神圣可怕的天帝命定论的观念，铸造了时人对奴隶制的等级制和礼制，只有“勤礼”、“守业”的人生准则，《春秋左传正义》谓“能者养之，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者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即敬天遵命，不逾法度便吉祥和顺；逆天命无法度，便咎由自取。守本分为福，非分之想为祸。天命是不可改变、不能违反的，那又何须看什么相，算什么命，研究什么命理呢？按照各人的名分，恭敬地“守业”，就是他们的唯一前途。因此在夏、商、西周初年这一天帝命定论的天命观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氛围中，相术、命学没有扎根生长的土壤，也不存在看相、算命的习俗。那时的迷信习俗，主要为“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天地之道贞观者也”的领悟天命的卜筮。所以荀子斩钉截铁地说：

“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荀子·非相》）

荀子生活于战国，距三代之末不过几百年，他的论断，远比后人无凭无据的猜想要准确得多，是可信的。

2. 混沌初开：春秋战国之际个人命运 的思考和相术的诞生

从现有材料来看，确切地说，中国命理学最早出现的样式是相术。

稽考信史，相术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春秋之际。它首先兴起于统治阶级内部。《春秋左氏传·文元年》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在一次会葬中，孟穆伯公孙敖听说周内史

叔服会看相，于是就请他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看相。他看后推断公孙敖一个名叫“难”的儿子是为他送终的“收子”，另一个名叫仲孙谷的儿子为继承香火的“食子”，必有后代于鲁国。后来仲孙谷果然生有一子，名茂，即孟献子，为鲁国贤大夫。另据记载，活动于公元前六世纪的赵简子的大夫，郑国人姑布子卿，当时也已经以精于相术而闻名于世。东汉赵晔著的历史书籍《吴越春秋》中还记有这样一个故事：生活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吴公子光想谋杀王僚，苦于没有得力的人辅佐，于是暗暗命一位名叫市史的相士为他寻找义士，正巧遇楚人伍子胥为躲避平王之祸亡命吴国，披发跣足，沿街乞讨，市人中没有一人能看出来，而这位相士一见就识破，说，我相过的人够多了，但没有一个人能及上您的，您莫非是从异国来的王臣吧？于是邀请他共举大事。另外还有越国大夫范蠡评价勾践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的故事，和楚子文评说司马子良儿子命相的传说。从这些极为有限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看相的风气至少春秋时已在贵族阶层中形成，所以袁枚说，相术最古，《左传》中记载的公孙敖请叔服为儿子看相的史实，可为相术的滥觞。明代最为著名的相术大家袁柳庄也说：“系相人之有术兮，肇东周之叔服。”周内史叔服是史书所记载的第一位相士。而当时的相士中又以姑布子卿最为著名。

战国时期，看相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如《增孔子·执节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魏国国君魏安厘王询问子顺说，马回有大夫的气节，我想拜他为相，您看合适吗？子顺说，他有否气节我可不清楚，我听别人说长眼睛，又像猪一样看东西的人定是很诡诈的，我看他就是这类人。魏安厘王还是用了他。后来，不幸被子顺所言中，马回果然以谄获罪。另结合荀子“相入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的慨叹来看，至战

国，相命的风气已从贵族阶层蔓延到民间，初步形成一种民俗。

相术之所以能在春秋、战国时出现，当然是因为它遇到了适合自己萌芽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气候。

殷王朝的被推翻，带来了神学政治的危机，西周末年，国人暴动，打破天子国君神圣不可侵犯的谎言，进入春秋，政治舞台上全面开打，热闹非凡：

“昔周道衰陵，乾纲绝纽，礼坏乐崩，彝伦攸斁，
杀逆篡盗者国有，淫纵破义者比肩，是以妖灾灾因寡
而作，民俗染化而迁。”（《春秋穀梁传·序》）

中国社会春秋迄汉，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的历史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支援政治上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财力参与政事；诸侯为了争霸，被势所迫，只好任用宗法血缘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春秋时贫穷到为人赶车的宁戚凭才能被齐恒公拜为上卿，后又升为国相；奴隶出身的百里奚凭智谋相秦七年而霸，开了庶人为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臆、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原先上帝命定为奴隶主的阶层，有的因权力争夺，死于非命，《春秋》之中，“杀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如孔子为宋国贵族，不得已“为贫而仕”，甚至常当小吏、教书以谋生，庄子虽为王族，更是几乎沦为乞丐。

以血缘远近定人尊卑、贵贱的奴隶制的动摇，必然引起天帝命定论的信仰危机，于是在时人们囟天帝命定论的同时，有

些人不再笃信冥冥的上帝，他们撇开血缘决定命运的观念，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

人的思维和认识，总要受到已有知识的限制，并以已有知识为阶梯的，那么提供给刚刚从黑暗的天命观的缝隙中探出头来研究个人命运这个新课题的时人思想资料又是什么呢？

中国先民对传说中的始祖和夏、商、周三代现实中的圣贤形象，几乎每一个人都有种种奇异的描述：

“太昊庖牺氏……蛇身人首。”（《史记·补三皇本纪》）

“神龙……人身牛首。”（《史记·补三皇本纪》）

“帝誉方颐虎视。”（《合诚图》）

“黄帝兑颐，黑帝修须，苍帝并乳。”（《河图》）

“尧（眉）八采，舜二瞳子，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羿左臂修而善射。”（《淮南子》）

“汤臂再肘，武王望阳，周公背偻，皋陶鸟口。”（《论衡》）

这种圣人必具“圣相”的传说，原先或是不同氏族图腾的折射，或是后为凸现他们的神奇而虚构的故事，但对缺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绝大多数古人来说，则相信这是真的。相反，若圣人模样和凡人一样，反而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尽管不同时代的人们精心塑造人形象有着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但却共同塑成了“圣人即圣相”的迷信观念。这种观念中人之深，乃至三代以后的各代帝王将相，往往也都有一段“圣相”的传说 [1]。

长得不伦不类、奇形怪状的人反为圣人，便有显赫的地位和光辉的业绩，在我们看来这种奇谈怪论是多么的荒诞不经，但我国先人对个人命运思考的最初水平只是如此。如果我们以今

人的认识水平，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来估价任何历史文化现象，便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一没有褪尽神学色彩的推演公式，虽然十分幼稚，但能从以血缘远近为依据来决定命运的自然命定论，标志着古人对自我命运的最初思考。对这一观念进一步深究和具体实践，便形成了我国命理学家族中最早的样式——以人的形相是否特殊来推究人的命运的相命之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著名相士之一，春秋时的楚人姑布子卿，就是这一派的开山祖。相传他曾给孔子看相，说孔子具有4位圣人的异相，即像尧一样的面颊；像舜一样的眼仁；像禹一样的脖颈；嘴和皋陶一样，像鸟嘴。战国时的著名相士魏人唐举，也持这一理论。相传他为李兑看相，说他“百日之内，持国秉政”。后果然如此。燕人蔡泽慕名请他相命，唐举仔细地辨查后说，您鼻高肩宽，容貌魁回，我听说圣人奇形，您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蔡泽说，富贵我早已有了，请您看看我的寿命，唐举说他还有四十三年可活，后也应验。将一个贵族与历史上的圣人相提并论，尽管唐举有巴结贵人之嫌，但它至少也说明时人已有凡人只要具有“奇形”也可成为“圣人”这样一个相对平等的观念。

就像虚幻的海市蜃楼只有瞬间的光彩一样，以虚构的奇形即圣人为理论依据的相术，虽然时髦了一阵子，但当人们冷静下来，再进一步提出为何现实生活中的凡人与圣人的“奇形”相同而命运截然不同的实实在在的疑问时，相士便又捉襟见肘，一筹莫展，陷入无法自圆其说的窘迫境地了。

在持“奇形即圣人”理论的相士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之际，另一派相士却春风得意，赢得了极大的市场。

中国长期的农牧业生产，使古代先民对牛马六畜具有丰富的养殖经验和鉴别知识。远在相术产生之前，中国就有了相牛

相马的风气。相传在中国上古的黄帝之时，已有个叫马师皇的兽医，“善识马之形气生死。”中国第一部《相牛经》出自公元前七世纪齐恒公的车夫宁威，后又传给了百里奚。这些传说的真假，难以稽考。但史籍中也确有不少可信的记载，如相命的习俗刚刚兴起之时，就出现了赵国的王良、秦国的伯乐等这样一批相马名家，他们的鉴别能力已达到了“尤尽其妙”的境界。《庄子》中载徐无鬼见魏侯，“告之以相狗马。”《史记·日者列传》载：“黄直，大夫也；……以相马立名天下。”又载：“留长孺以相彘立名。”荥阳褚氏以相牛立名。另外还有种种“相鹤”、“相雉”、“相鸭”、“相鸡”、“相鹅”之术。《吕氏春秋·观表篇》中对这类相法的记述更详：“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鬣，许鄙相臀，投伐褐相胸肋。管青相肝肠，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良工也。”并认为“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

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时期，一些哲学家常常用气的凝聚解释万物的生成。如庄子论生死的自然过程时说：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之则生，散则为死。”

《庄子·知北游》

“察其始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芴蒨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

就是说人的形体生命本源于“气”。管子也有相似的思想：

“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为人。”（《管子·内业》）

业》）

这种人为天地产物，气为万物构成的原素的自然观，在先秦

有一定影响。长期形成的因果类推的传统逻辑思维定势，使古人从相牛、相马中得到了启发，产生了另一种幼稚的联想，既然牲畜具有不同的寿命、脾性、能力，并相关地呈现出不同骨骼、形体、颜色、毛发，那么人也是天地所生的生灵，气化的产物，也应有禀性、寿夭、聪愚，乃至贵贱、吉凶、祸福的不同，并相关地在人的形体上出现有规律的特徵。这一思路来自于现实生活的直接经验，又与时人的哲学思想、认识水平相一致，得到了时人普遍的首肯。《庄子·徐无鬼》中记载当时的相马名家九方甄曾为楚司马子綦的八个儿子看过相，这种集相马相人于一身的相士的出现，正是这一思路的具体实践，而后世诸如既善相马也善相人的魏时朱建平这样的术士的蕃衍，又是这一文化传统的继续，《汉书·艺文志》在论“形法”时说：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

从汉人对包括在“形法”之内的相术本质特点的高度概括中，也可透露出相术理论发端的消息。

这种以“形气”说为理论基础的相术，已褪去了“奇形即圣人”的神秘色彩，代表了中国相术的正脉。由此可见，作为命学最早样式的相术，在今天看来无疑是种落后愚昧的文化现象，但在当时，它不仅是中国人对个人命运积极而严肃的思考，而且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科学”探索，它的出现，无疑是对当时更为蒙昧的神权政体和天帝命定论的巨大冲击，是历史进步的产物。

3. 点化成金：两汉之际的相命热以及相术、命学理论的初建

汉朝的建立既非天授亦非祖传，全靠在铁马金戈的厮杀中夺得。打天下也罢，守江山也好，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大量官员不得不从民间去寻找。发难之前的汉高祖刘邦只不过是较为富足的庄稼汉，帮助他开创鸿业的“猛士”大多为平民百姓。陈平是游士，樊哙是狗屠，周勃是吹鼓手，灌婴是布贩，娄敬是车夫，韩信是流氓，彭越是强盗。诚如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所概括的：“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刘邦依靠他们做了皇帝，他们也凭战功和才能从社会的最下层一跃为统治阶级的最上层。

汉高祖封跟他起事的文武功臣 143 人，其中不乏这样的人物，他们有的为大侯，食一万户，有的为小侯，食五六百户，极尽人间富贵。这一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对春秋战国以来已经失势的以血缘亲疏定贵贱的天帝命定论无疑是一声棒喝。为充实官僚机构，汉高祖又征召天下贤士大夫到京师分派官员，从军官吏也按功劳大小，规定各种待遇，士人有了做官的盼头，士卒有了升迁的奔头。西汉还设太学，就读的博士弟子可以“学而优则仕”，跻身统治阶级的行列，学子有了从政的机会。汉武帝时对招纳人才更为重视，访求超拔，使“群士慕乡，异人并出”。东汉士人做官有公府辟召，举孝廉等途径。但凡这些或多或少的政治制度、仕进制度的改革，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权力的人事更动，总要为一批人造成改变社会地位的个人际遇，造成同一阶层的人中的不同命运的极大“落差”。对成功者的艳羡，对落难者的惊愕，思不断，理还乱，归根结底又汇成一声声对个人命运的慨叹。有的人不能从社会人事中寻找原因，只好以命的厚薄、气运的顺逆聊以自慰。这一“精神气候”又为相术、命学的泛滥，相骨相、算命巫俗的日炽创造了合适的温